



# 私人办电影队（院）：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的短期实践

○ 何玉斌 刘长宇

**摘要：**1983 年，在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模式变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私人电影队（院）脱胎于个体承包电影放映的形式，逐渐发展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的主力军。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电视的逐渐普及和各地录像放映活动的扩大，转移了农民文化需求的满足途径，私人电影队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之中。在农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国家摸索出了一条市场探索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农村电影发展道路，私人电影队（院）实现了农村电影放映在队伍建设、经营方式和观看方式等方面的市场化探索，使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完全进入到市场化时期。与此同时，在国办、集体办队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私人电影队（院）还积极承担起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的重要功能，克服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文化参与度，创造出一个健康有序的农村文化风貌。

**关键词：**私人电影队（院） 农村电影放映 市场化探索 公共文化服务

何玉斌，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刘长宇，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在重写电影史的热潮下，农村电影放映队成为一个被不断提及、反复尝试抵达的历史对象。经过专家学者们的长期深耕和史海钩沉，形成了涉及传播学、社会学、电影学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和认知。但纵观这些研究序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忽略了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基本性质和时代差异，将国办队、社办队、队办队和私人办队作为一个无差别整体来对待，将其一并指认为“农村电影放映队”。如果说前三者从所有制形式上来说都属于公有制的话，那么后者则带有明显的私有制属性，这一属性不仅意味着其出现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具体的影事实践过程中直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电影放映队。1985年，全国现有的十几万个农村电影放映队中“国办队已经很少，绝大多数采取以下两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即：一是乡、村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二是个体所有，个体经营”<sup>[1]</sup>。这足以说明私人办电影队（院）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农村电影放映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数量庞大的私人办电影队（院）却被一个更具概括性的概念遮蔽了。当我们再次回瞻当时农村电影放映的主力军，便会发现它并非丧失了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而是以一种嵌入式的姿态同国办、集体办队共同组成了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多元格局，深度参与并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电影放映的市场化进程。

将私人办电影队（院）从历史的褶皱中拽出，并放置于经济史与电影放映史的交叉语境中，重新审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电影产业的多元发展脉络，并成为丰富中国电影文化史和农村电影放映史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旨在将私人办电影队（院）从“农村电影放映队”这一总览性概念中脱离出来，单独考察其出现的经济、历史、文化动因，以及它是如何在众说纷纭的激烈论争中逐渐发展壮大，从彼时农村电影放映的补充力量成为主体性力量，从而完善了农村电影放映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私人办电影队（院）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通过哪些具体措施实现了农村放映体制的革新，从而推进了农村电影放映的市场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尝试厘清作为个人经营性质的文化企业，私人办电影队（院）是如何实现在追求个人创收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兼顾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一、政策与实践：私人电影队（院）的旧貌新颜

1980年初，随着农村全面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家庭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而一般生产队则失去了经济基础，没有公积金包场看电影。许多农村电影放映队便遇到了“联系没人管、收费没处要、机器没人送、吃饭没派”<sup>[2]</sup>的现实困难，一些社办、队办电影队被迫停止了放映活动，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民“看电影难”问题的出现。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地区农村电影队开始“试行‘包机到人，定点巡回放映’的办法”<sup>[3]</sup>，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农村电影放映承包给了农民个人。从具体执行方式来看，放映机的所有权不变，仍归集体所有，使用权交给放映员，由放映员包机放映。映出的收入除了按规定交回每场次片租和机器折旧费等费用之外，其余全部由放映员自行支配，实行经济大包干。放映员可以用这些收入交片租和购置油料等，也为自己开工资。甘肃省、山西省、安徽省等地方率先在偏远农村地区采取私人承包映出电影的办法，实现了“映出多，收入多；放映队满意，社队干部满意，群众满意，承包人满意”的“两多四满意”效果。<sup>[4]</sup>多映多收、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放映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在增加放映场次的同时，还提高了放映质量。可见，在农村集体包场看电影收费难的情况下，实行私人承包电影放映的形式是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的有效举措。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给承包的个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全国各地



私人办电影队(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甚至在一些地区已经兴办起来。不过由于 1982 年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明确指出“私人是不能办电影放映队的”。<sup>[5]</sup>因而,很多私人电影队并没有公开其身份,而是实行“个人全责任制”,以大队的名义在活动。也就是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个人承包电影放映的形式,实际上就是私人办电影队(院)的前身。除了所有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之外,在放映方式、收费标准等方面同私人办电影队相比而言,并无直接差异。直到 1983 年初,中共中央(1983)1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各种文化、卫生设施的建设,这些文化卫生设施,国家办,集体办,更要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己办。”<sup>[6]</sup>政策上的允许和支持,让私人电影队(院)蜕去了大队办和承包制的旧貌,焕发新颜,正式以私人办的面目出现,成为全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一件新事”。<sup>[7]</sup>

随后,各地方纷纷开始响应文件精神,并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了具体意见。四川省文化厅提出了《关于私人办电影院、放映队的意见》,其中指出“农村私人办电影作为国家、集体电影放映的补充力量,应予重视和支持”<sup>[8]</sup>。安徽省文化局在采取“政策上允许,行动上支持”的做法的前提下,还从人员培训、器材供应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各地在具体做法上的引导和帮助,使得私人办电影队(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截至 1983 年 5 月,“安徽省农村已经发展了三百多个私人办的电影院、放映队”<sup>[9]</sup>,1983 年末,浙江省湖州市“全市个体电影队增至 45 个。次年又增至历史最高纪录的 73 个”<sup>[10]</sup>。而在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青海省,1983 年也出现了 36 支私人放映队。<sup>[11]</sup>由此可见,私人办电影队(院)的这一形式已经开始在我国中西部及东部等大部分地区出现。“这种私人办电影高潮的出现,使我国农村电影放映单位最多时达到了 15 万个,平均每个公社或乡镇有三四个电影队。”<sup>[12]</sup>在数量增多的同时,私人办电影队(院)在形式上也开始多样化,不仅有个人办,还出现了几个农户集资合办的情况。通过增加放映场次,采取有钱付钱,无钱暂欠或以粮折款等灵活收费的方式,私人办电影队(院)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作为农村电影放映的一股补充力量,即使在那些国办和集体办放映队惠及不到的偏远山区,私人电影放映队仍能为他们带去活动的影像,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电影放映网。

1985 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困难。尤其是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严重受挫,仅这一年“农村 15 万个放映单位,其中就有 4 万多个停止活动”<sup>[14]</sup>,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私人电影放映队。由于发展初期各项规定和制度还不够成熟,有些地方规定的上缴利润指标过高,很多私人电影队因难以达到而停止活动。加之 1985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以后,许多地方把筹集电影包场费,列入“乱筹资”“乱摊派”的范围。这样一来更加加重了放电影收费难的问题,私人电影队无法实现经济收益,

表 1 咸宁市(县)电影放映队发展情况统计表(1980—1985)<sup>[13]</sup>

性质	合计		国办		集体办		厂校办		个体办	
	队数	人数	队数	人数	队数	人数	队数	人数	队数	人数
1980	116	267	8	67	88	164	18	32	2	4
1981	115	264	2	70	84	168	21	18	3	6
1982	105	275	6	77	76	152	18	36	5	10
1983	109	277	6	77	74	146	16	28	13	26
1984	124	302	2	76	63	124	13	24	41	78
1985	123	298	6	74	64	126	13	22	40	76

有些人便将放映设备转手卖掉,另谋出路。在面对外部压力的同时,私人办电影队(院)还由于自身管理的不完善,出现了瞒报场次、偷漏片租、贪污收入等一系列问题,队伍的稳定性极差,“造成中途夭折”<sup>[15]</sup>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让农村电影放映重新活跃起来,1986 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文化部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解决当前农村看电影难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群众所接受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不能被视为‘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对那

些已不适应目前形势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应研究提出新办法予以取代……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电影放映活动的组织领导和规划放映的管理”<sup>[16]</sup>。随后，各地各部门根据意见和出现的具体问题，通过划分放映范围、固定收费标准、开展业务培训等措施，加强对私人办电影队（院）的管理和引导，使其逐步走上了专业化和规范化放映道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据统计，1987 年河南省“电影队达到 13211 个（其中个体电影队 8237 个）……农村电影观众由 1982 年的 15.5 亿人次上升到 1987 年的 23.8 亿人次”<sup>[17]</sup>。同年，湖南省“有个体放映队 7375 个，占农村放映单位总数的 64.5%”<sup>[18]</sup>。可见，这些举措有效解决了私人电影队（院）在发展之初显现出来的各种弊端，从制度和管理上保障了私人电影队（院）的快速发展。在“我们生活好了，电影队跑了”<sup>[19]</sup>的抱怨声中，私人办电影队（院）成为农村电影放映的主体性力量，使农村电影放映活动重新活跃起来。由此，私人办电影队（院）实现了从农村电影放映补充力量到主体力量的过渡，开始全面参与到新时期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和文化建设事业当中。

在随后的短短的几年里，私人办电影队（院）“数量远远地超过全民和集体放映队的总和，大有独霸农村电影市场之势”<sup>[20]</sup>。但这种快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规划的。在学者刘广宇看来，对私人办电影放任主义的态度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放映队伍的急剧增加同满足这种增加所需要节目的加量、管理条件与能力、放映条件、经济支持以及农民的文化需求是严重脱节的。<sup>[21]</sup>也就是说当时农村电影放映的市场条件还远不充分，自生自灭就成了私人电影放映队（院）唯一的发展逻辑。尤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电视的逐渐普及和各地录像放映活动的扩大，转移了农民文化需求的满足途径，农村电影放映很快进入了又一个低谷。“据 16 个省区情况统计，1993 年全国的农村电影放映收入从 2.1 亿元下降至不足 1 亿元；农村放映队减少了 2.7 万个，下降 61%；其中 10 个省农村电影观众减少 15 亿人次，下降 64%，县级公司约 70% 亏损。”<sup>[22]</sup>大多数农村电影放映员因收入的微薄甚至倒贴而不得不放弃电影放映事业，曾经盛极一时的私人电影队（院）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二、电影专业户：农村电影放映的市场化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民的全部消费中，商品性支出的比重，已由 1979 年的 39.7%，增加到 1982 年的 56.5%，到 1983 年，全社会 50% 以上的购买力，货币总量的 60% 以上都在农村”<sup>[23]</sup>。但与之形成明显矛盾的是，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收入却来自人口和货币总量更少的城市，据统计，1980 年全国农村电影市场放映总收入 27154 万元，仅占全国城乡放映总收入的 21.8%。<sup>[24]</sup>这让相关部门认识到了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如何使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与农村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扩大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成为彼时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重心。为了进一步挖掘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满足八亿农民对电影消费不断增长的需求，国家在允许私人承包电影放映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电影放映作为生产资料被私人所有和经营。于是，私人开始兴办电影队（院），走上了“电影专业户”的发展道路，而这将成为农村电影放映实现市场化发展的关键切入点。

从具体路径来看，私人办电影队（院）对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化的探索首先体现在队伍建设方面。在人员身份上，国办队中队长由上级主管单位直接任命，其余队员则来自省市级正规培训班，其身份是国家干部；集体办队（社办队、队办队）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回乡知青”，其身份是人民公社“八大员”<sup>[25]</sup>之一，作为准国家干部从事电影放映；而私人电影队（院）成员均为普通农民，其身份完全社会化，以“专业户”的形式存在。这就意味着私人电影队（院）的放映员失去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生活补贴，而以“专业户”的

形式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实现了分配方式的市场化探索。私人办电影队（院）改变了以往电影放映机、发电机等设备作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局面，通过购买的方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这就导致私人电影队（院）不再单纯地将农村电影放映作为一项国家福利事业而对待，而是首先将其作为生产资料用以实现盈利目的。山西省夏县，“青年农民刘斌投资3000余元，购买了放映机和发电机等全套设备，在自家院里放电影。开业4个月就放映40场，收入达2000元。除片租、管理等开支外，每个月纯收入200元”<sup>[26]</sup>。可见，私人电影队（院）的出现，打破了国办队、集体办队将“放映收入全部上交”<sup>[27]</sup>，采取工资报酬制的分配方式，实现了“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市场化的分配方式，从根本上建立起了实现农村电影市场化的基础。

放映主体的调整使得部分农民实现了个人创收，农村主体的经济动能得以激活。由此产生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自觉地研究市场、搜集信息，因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放映活动。一部分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先富裕了起来，同时还为电影公司和政府创造了远高于以往的片租与税收，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据统计，1988年农村电影放映收入达到54814.8万元，相较于1980年增长率高达100%，全国城乡放映总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21.8%增长为30.4%。<sup>[28]</sup>作为这一阶段农村电影放映的主体性力量，私人电影队（院）无疑为农村电影的市场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建立起与新型农村关系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在这一点上，私人电影队（院）体现出了专业户的优势和力量，他们利用仓库、旧宅地、私人宅等场所建起临时售票点，使售票放映在村一级开始实现。1987年，湖南省农村放映专业户自建自营的售票放映场“达到842个，占全省农村售票点总数的34.7%”<sup>[29]</sup>。在农村建立售票放映点，代替包场放映的办法，完全避免了包场放映那种“摊了钱的人没有电影看，没有出钱的人白看电影”<sup>[30]</sup>的现象，从根本上解决了收费难的问题。不少农民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集体包场看电影不掏钱的福利观念，主动掏钱买票看电影，电影的商品属性逐渐被农民群众接受。这一过程中，电影作为文化商品被用以交换和消费，采取了“谁看电影谁出钱”的收费方式。而这正好实现了丁达明同志关于开发农村市场“三个过渡”构想中重要的一条：“从包场看电影逐步过渡到售票收费看电影。”<sup>[31]</sup>这一过渡的实现尤为重要，因为售票放映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相吻合的，它意味着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新框架，为扩大和繁荣农村电影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私人办电影院还实现了“三个过渡”中的第二条，让农民从露天站着看，逐步过渡到室内坐着看。例如，浙江省乐清县“上陈大队社员汪国明联合另外七个社员，共投资九股，建成了一座拥有九百个座位的电影院”<sup>[32]</sup>，为观众提供良好的观影条件和环境，这实际上是对电影影院本体属性的一次回归，实现了电影观看方式的市场化。不过，这一点在集镇影院的建设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新时期以来，市场化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农村来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进和完善，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成为主要目标。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组织形式开始超越农田范围，迈入更为广阔的经济领域，走上专业化、商品化道路，于是专业户便各个领域诞生了。而作为电影专业户的私人电影队（院），不仅满足了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为个人和社会创造了财富，充分挖掘了农村电影市场的潜力，有效解决了“收费难、放映难”的尖锐矛盾。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电影放映的一次有效实践，私人电影队（院）的出现“是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政策的”<sup>[33]</sup>。它实现了农村电影放映在分配方式、经营方式和观看方式等方面的市场化探索，使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完全进入到市场化时期，有效盘活了这一时期农村电影放映生态。同时，也为1993年中国电影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特殊经验。



### 三、文化个体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建

《电影普及》从1983年第8期开始,在“工作研究”栏目刊发了多篇针对私人办电影队(院)进行讨论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私人办电影队是“某些领导生搬硬套经济部门的做法,把电影队当成赚钱的副业队”<sup>[34]</sup>,最终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念,他们认为,私人电影队“利少弊多,不宜提倡”<sup>[35]</sup>。而与之相反的另一观点则认为,私人办电影队出现各种问题是因相关制度规定还没有跟上,而不是其本身不合理。因此,在加强和改善管理的基础上,私人办电影队应“大力发展,适当控制”<sup>[36]</sup>。表面来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围绕私人办电影队的利弊而展开的,但事实上,却关联着电影的属性问题。反对者担心私人电影队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忽略了电影的社会文化功能,偏离了电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而支持者则认为,私人电影队通过增加放映场次、扩大放映范围,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这是对电影社会文化功能的一种强化和拓展。由此,这场围绕私人电影队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却在内部逻辑上暗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电影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1983年,四川省文化厅发布的《关于私人办电影院、放映队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农村私人办的电影院、放映队,属农村个人经营性质的文化企业,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sup>[37]</sup>这从性质上决定了私人办电影队(院)首先扮演的不是以纯粹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个体户,而是作为公社文化事业补充的“文化个体户”。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便成了其要承担的基本责任。

新时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破坏,群众文化活动几乎处于缺席状态。为数不多的文化活动仍然“是以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为主”<sup>[38]</sup>。农村电影放映队也是“送”文化下乡的方式之一,因而,在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中,农民只出现在最终的观看环节,他们的文化需求或强烈或微弱,都影响不了农村文化供给的单一格局,“有的只是接受的权利和义务”<sup>[39]</sup>。而新时期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开始主动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一部分人开始兴办电影队、电影院,形成了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内生机制。“这种农民为自己办文化的生动景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sup>[40]</sup>也就是说,私人办电影队(院)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打破了“只输入,不培育”的农村文化供给模式。从农村内部生发出的文化建设队伍,让农民不再单纯地扮演文化接受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不少农民娶媳妇、办喜事都要请来放映队放映一场电影。”<sup>[41]</sup>此时,私人放映队会根据农户的具体要求,提供上门放映。电影进入寻常百姓家,为私人包场放映不再被定义为“典型的封资修行为”而遭受批评。相反,在农村电影放映市场中,“私人包场市场最大”<sup>[42]</sup>,包场放电影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农民在节庆日的不良风俗习惯,“打牌赌博、搞封建迷信活动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sup>[43]</sup>。私人电影队(院)在实现经济收益的同时,积极投身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发挥了“文化个体户”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农村社会氛围和社会秩序的改善,“人民群众三两天便有电影看,社会秩序大有好转”<sup>[44]</sup>。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办电影队(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集体放映电影过程中,农民作为文化群演和文化旁观者的被动式出席特征,是对农民“呼唤电影下乡”这一文化需求的主动满足。<sup>[45]</sup>

除此之外,私人办电影队(院)的出现还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文化参与度。这一作用直观地体现在私人办电影队(院)出现后,农村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的提升。以河南省为例,“1987年底全省流动电影放映队达到13211个队,其中个体电影队增加到8237个队。由于农村电影队的迅猛发展,农村电影观众由1979年的15.7亿人次,到1987年增加到23.8亿人次……禹县磨街李功电影队,1985年成立当年就放映500多场电影,1986年更上一层楼,放映场次增加到600多场”<sup>[46]</sup>。可以看到,在国办、集体办电影队日渐式微、农民缺少文化生

表 2 全州县民办电影事业历年情况表 (1980—1989)<sup>[49]</sup>

年份	民办队数		放映长片数	放映短片数	观众人次 (万人次)	放映收入 (万元)	上缴片租 (万元)
	16 毫米	8.75 毫米					
1980	57	42	13527	966	915.21	15.94	5.48
1981	57	47	7639	834	663.91	10.48	3.43
1982	60	65	9122	255	593.58	11.93	3.97
1983	70	78	10968	669	640.12	13.42	4.41
1984	79	78	8228	175	513.97	9.96	3.91
1985	60	59	13937	108	742.1	17.15	9.8
1986	70	66	21848	772	1035.41	24.42	14.6
1987	80	60	21748	1349	1029.37	56.24	18.39
1988	98	50	14710	1351	1023.57	49.6	20.37
1989	94	41	11055	743	752.99	47.67	19.17

活的背景下，私人办电影队（院）“上山路，爬高坡，过山沟，跨小河”<sup>[47]</sup>，日夜放映，凭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农民提供了参与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渠道，保障了农民首先能看到电影，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多看的文化需求，顺应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双重需要。最终达到“如今吃穿不用愁，夜晚银幕挂村头，家家户户传笑声，生活一步一层楼”的农村生活图景和文化氛围。<sup>[48]</sup>

1986 年，河南省电影公司刘东初曾对河南省部分县的 60 个个体电影队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多项式答案发现，“农民个人办电影队出于发家致富动机的占 53%；出于个人爱好的占 50%；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占 80%；为了取得社会信任和实现个人才能的占 38%”<sup>[50]</sup>。这说明，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已经成为私人创办电影队（院）的基本共识和长远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私人电影队（院）甚至为特殊的农民群体和偏远山区的观众提供免费放映服务。福建连城李仰峰的电影院规定：“70 岁以上的老人和一公尺以下的小孩，可以免票进场。”<sup>[51]</sup>湖北巴东县农民黄本义创办的个体电影队，“除巡回放映外，还为儿童、孤寡老人、贫困户免费放映”<sup>[52]</sup>，1984 年，黄本义的电影队还被授予全省文明单位，无疑是对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突出贡献的一种肯定。作为“文化个体户”，私人电影队（院）在具体的放映活动中，并非“将电影当成个人‘捞一把’的工具”<sup>[53]</sup>，而是始终坚持电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在国办和集体办队的日渐萎缩的现实境遇下，私人电影队（院）的出现满足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农民的文化参与度，补充了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不良社会风气，创造出一个健康、活跃、有序的农村文化风貌。

## 结语

私人电影队（院）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的重要组成力量，长期活跃在一线群众的视野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彼时农村电影放映的衰落局面。表面来看，它不过是庞大放映网中的一个支线，但作为“电影专业户”，它的出现事实上推动了农村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作为“文化个体户”，私人电影队（院）在具体放映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原本凋敝和衰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得以重建。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私人电影队（院）的出现标志农村电影放映体系的渐趋成熟，它是在农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国家摸索出的一条市场探索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农村电影发展道路。因此，基于私人电影队（院）的特殊身份和独特贡献，将其从“电影放映队”这一统称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分析其发展脉络和影史实践，重新审视其在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中的角色和功能，对当下如何推动农村电影市场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刘洋）

## 注释:

- [1] 杨柯. 一九八五年电影发行放映回顾工作 [A].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6[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11-3.
- [2] 曹永安. 甘肃省农村电影放映队试行“包机到人”——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 [J]. 电影普及, 1981 (10): 18.
- [3] 曹永安. 甘肃省农村电影放映队试行“包机到人”——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 [J]. 电影普及, 1981 (10): 18.
- [4] 参见山西省浑源县电影公司. 私人承包电影是解决收费难的一个办法 [J]. 电影普及, 1981 (10): 18.
- [5] 佚名. 关于发展农村电影放映队问题 [N]. 人民日报, 1982-05-05 (8).
- [6]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83]1 号.
- [7] 杨柯. 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两件新事 [A].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3[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 75.
- [8] 关于农村私人办电影院、放映队的意见. 川文电 [1983]9 号.
- [9] 周伟. 安徽省积极支持私人办电影院、电影队 [J]. 电影普及, 1983 (5): 6.
- [10] 《湖州市电影志》编纂委员会. 湖州市电影志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96.
- [11] 参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青海分会编辑. 青海电影志 [M]. 青海省文化厅, 1989: 284.
- [12] 刘广宇.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99.
- [13] 咸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咸宁市志 [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696.
- [14] 杨柯. 一九八五年电影发行放映回顾工作 [A].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6[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11-3.
- [15] 河北省任县电影公司. 农村个体电影队管理工作的探索 [J]. 电影普及, 1985 (6): 10.
- [16] 关于解决当前农村看电影难问题的意见. 广发影字 [1986] 351 号.
- [17]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河南省志第 53 卷文化志·档案志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406.
- [18] 吴石虹. 谈谈农村电影放映专业户 [J]. 电影经济, 1989 (2): 30.
- [19] 李德润. 农民反映: 我们生活好了, 电影队跑了! [N]. 人民日报, 1986-05-77 (3).
- [20] 刘东初. 关于个体电影队的思考 [J]. 电影经济, 1989 (1): 9.
- [21] 刘广宇.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99.
- [22] 毛羽, 樊江华, 冯颖. 农村市场——中国电影未曾忘却的广阔天地 [A].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93[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205.
- [23]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理论研究部. 论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 [A]. 中国电影家协会, 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8[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1: 12-9.
- [24] 参见季洪. 电影发行放映十年纪事 [A]. 陈播. 季洪电影经济文选 [C].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293-297.
- [25] 八大员: “文革”后期流行的一个词语, 主要指在人民公社党委和政府机构中用作对公社主要政务职能 (八个方面) 的补充和扩大的一个编外人员群体. 其身份性质是“社来社去, 走亦工亦农的道路”, 包括: 广播员、农技员、蚕桑员、宣传员、放映员、农林员、饲养员、水利员.
- [26] 张秀峰. 夏县农民办家庭电影院 [N]. 人民日报, 1989-01-05 (3).
- [27] 刘广宇.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71.
- [28] 参见季洪. 电影发行放映十年纪事 [A]. 陈播. 季洪电影经济文选 [C].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293-297.
- [29] 吴石虹. 谈谈农村电影放映专业户 [J]. 电影经济, 1989 (2): 29.
- [30] 魏光沛. 开展售票放映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必由之路 [J]. 电影经济, 1988 (3): 32.
- [31] 纪小平. 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经验交流会在三明市举行 [A]. 中国电影家协会, 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8[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1: 12-13.
- [32] 佚名. 八户农民联办电影院 [N]. 人民日报, 1983-02-19 (2).
- [33] 郑达. 抓紧改革, 搞好建设, 开创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新局面 [A]. 季洪, 陈烁主编. 南粤银海潮 [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46.
- [34] 李一清, 张明. 私人办电影队应严格控制适当发展 [J]. 电影普及, 1983 (8): 20.
- [35] 陶风珊. 私人办电影队利少弊多 [J]. 电影普及, 1983 (12): 13.
- [36] 俞宽德, 雷千学. 私人办电影队应大力发展 适当控制——与李一清、张明同志商榷 [J]. 电影普及, 1983 (12): 13.
- [37] 关于农村私人办电影院、放映队的意见. 川文电 [1983]9 号.
- [38] 疏仁华. 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缺失与对策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7 (1): 61.
- [39] 刘广宇.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71.
- [40] 郑岩. 从实际出发 抓好农村文化建设——江苏农村文化的新面貌 [N]. 人民日报, 1984-06-18 (7).
- [41] 李亮亮, 白特峰. “泥腿子电影队”为临县农民添热闹 [N]. 人民日报, 1987-12-06(3).
- [42] 吴石虹. 试探农村电影市场的开拓 [J]. 电影经济, 1988 (1): 15.
- [43] 杨柯. 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两件新事 [A]. 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 中国电影年鉴 1983[C].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 75.
- [44] 俞宽德, 雷千学. 私人办电影队应大力发展 适当控制——与李一清、张明同志商榷 [J]. 电影普及, 1983 (12): 13.
- [45] 裴知强. 农民呼唤电影下乡 [N]. 人民日报, 1995-02-06 (4).
- [46] 刘东初编纂. 梁小岑编审. 河南电影志 1909—1987 年 [M].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河南省电影公司, 2000: 186.
- [47] 杨培志. 苗族的好放映员——记贵州麻江县铜鼓乡农民放映员赵元桥 [J]. 电影普及, 1986 (8): 15.
- [48] 佚名. 任县农民合股办电影队 [N]. 人民日报, 1983-03-12 (3).
- [49] 全州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全州县志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745.
- [50] 刘东初. 关于个体电影队的思考 [J]. 电影经济, 1989 (1): 12.
- [51] 张永和, 吴福瑞. 志在农家乐——记连城县揭乐大队电影专业户李仰峰 [J]. 电影普及, 1984 (12): 16.
- [52] 湖北省巴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巴东县志 [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485.
- [53] 陶风珊. 私人办电影队利少弊多 [J]. 电影普及, 1983 (12): 12.